

启蒙的“戏谑”与“沉痛”： 互文性视阈下的鲁迅小说思辨叙事

一、互文性视阈下鲁迅小说的叙事革新与知识分子困境

法国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深受巴赫金“复调”“对话”与“狂欢”理论的影响。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褶皱与变形；文本不是简单的语言现象，而是嵌入历史与社会之中。”其互文理论不仅打破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封闭性，更使文学研究超越语言学范畴，将文本作为整体进行阅读，探究文学与历史、文化、心理学及其他文本的关联。互文理论指出，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文本的价值正体现在对其他文本的解构与重构之中。

鲁迅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故事新编》，堪称这一理论的卓越实践。他以“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与“随意点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构建起独特的“跨文本互补”叙事策略，核心在于打破时空壁垒，让古今中外的人物、语言、事件在同一文本场域中碰撞、对话，进而生成全新意义。这部小说集虽以历史与传说为创作根基，却并非单纯抒写神话与历史故事，而是将过去与现在置于同一时空阐释，采用“集体时间”回望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实现古今时间的交融。在这些历史小说中，“今人”的身影无处不在，这正是鲁迅以新视角审视中国历史文化后，对前文本解构与重构的成果。

《故事新编》的互文性实践广泛且深刻。《补天》中，女娲补土造人的神话与古衣冠小丈夫的虚伪文官并置；《理水》中，大禹治水的伟业与文化山学者迂腐荒谬的讨论交织；《奔月》中，英雄羿的落寞与蓬蒙的背叛，暗合鲁迅对当时学术界“青年必胜过老年”论调的讽刺。这种叙事绝非简单引用古代文本，更是一种“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旨在通过解构完成重构，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古今对话中，“知识分子”作为形象群体，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思辨焦点。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塑造了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理水》中空谈、迂腐、崇拜的“文化山学者”，《出关》中无奈、虚无、被时代抛弃的老子，《非攻》中实干、坚毅的墨子。他们共同勾勒出关于知识、权力、道德与行动的复杂光谱，体现鲁迅对知识分子身份、责任与困境的持续思考。

《祝福》中的“我”，作为鲁迅笔下极具代表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与《故事新编》中的诸多知识分子形象形成鲜明而深刻的互文对照，二者相互印证、彼此补充。相较于《理水》中远离民间苦难、躲在书斋高谈阔论的文化山学者，“我”虽亲身回到鲁镇、亲临祥林嫂的苦难现场，却因身份隔离与思想局限，同样表现出面对苦难的无力感与精神疏离；对比《出关》中试图以超然态度逃避现实、却仍被世俗物质困于《摩诃庵》所困的老子，“我”在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终极追问时，也因无法给出明确答案而陷入“说不清”的逃避状态，暴露出内心深处和精神困境；相较于《非攻》中埋头苦干、以实际行动解决社会危机的墨子，“我”虽身负“启蒙者”的身份与使命，却在面对底层民众的真实痛苦时手足无措，其“启蒙者”身份更显苍白与可笑，难以真正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种跨文本的形象谱系，极大丰富了《祝福》的思辨内涵。“我”不仅是故事叙述者，更是被审视的对象。鲁迅通过“我”与祥林嫂的对话，“我”与鲁镇环境的格格不入及最终的选择性逃离，尖锐揭示了“五四”前后部分启蒙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他们理论上同情民众、情感与行动上却无法真正融入；掌握“新知识”，却无法解答底层民众最切身的精神痛苦；

大学英语教学中英汉互译应用的数字化支持与创新路径

杜晓军

二、教学融入：文化语境点燃互译学习热情

“跨界”课程的语言不只是知识的同质或异质互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思想的交流。技术手段为跨文化交际提供支持后，翻译课能够突破课堂限制，延伸到真实的文化语境中，从而加深学习的异文化意识。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4版“Unit2 Making the choice to be truly beautiful”为例，作为“跨文化审美辩论”的双向翻译作业，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需要翻译出中文版本的文章，并在重述原文对外在美、内在美的同时，结合中国文化中“修身养性”“外在美与内在美结合”的理念后再进行反向翻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词语的准确性，还应在翻译中适当加入文化注释，阐明翻译选择的理由。例如，“beauty is about inner qualities”直译为“美在于内在质量”，但如果再加上“self-cultivation(修身养性)”的理念就可以很好地体现将中国文化的衍生命义补充出来。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大屏幕分别展示每一个小组的翻译文本，让学生们对比“inner beauty”与“self-cultivation(修身养性)”两种表达方式的异同，使学生产生兴趣，同时对用英语表达这两种不同话语所产生的异同背后的东西方文化及审美观念差异等产生疑问。

基于以上案例，教师可以进一步丰富“网上会话”的活动要求，要求学生把Unit2中的翻译成品运用到真实的跨文化会话中。一部分学生扮演中国发言人的角色，用汉语介绍“东方美”的内涵；另外一部分学生就需要把他们的发言文本翻译成英语，并用网上会议方式展示。然后角色互换，学生们要翻译出西方法庭代表所讲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表现和个性的自我评估”的内容。数字化平台可生成中英文字幕，便于学生对比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一设计更贴近真实世界的会话场景，而不仅仅是课堂上的训练项目。在这个假想的情境中，翻译已成为一种交际工具。因此，学生能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交流实践中体验翻译的重要性及难点。

三、创新路径：多维协同驱动互译教育升级

要实现互译教学的功能，需将课程习题向实际应用场景转化，以便在模拟情境中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与跨文化思维能力。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4版)“Unit3 China’s new wave of young innovators”为例，教师可将其转化为“创新产品宣传广告”；学生完成翻译任务后，按团队划分选择创新项目，将汉语

张花

企图启蒙，最终却沦为“看客”之一，甚至间接参与“无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共谋。这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使《祝福》超越简单的反封建礼教主题，升华为关于“启蒙为何失败”的思辨性寓言。

二、案例深描：《祝福》的跨文本思辨性解读

《祝福》的思辨性不仅体现在与《故事新编》的跨文本关联中，还深入渗透在其自身细腻叙事结构设计及复杂的人物形象塑造之中，构建了一个充满多重声音对话的叙事场域，这与《故事新编》中打破时空限制的“狂欢化”叙事在精神内核上异曲同工，均旨在通过多元对话激发读者的深度思考。

首先，在叙事结构上，《祝福》采用了复杂的双重倒叙框架。故事始于“我”在旧历年底回到鲁镇的所见所闻，中间插入了关于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详细叙述，最后又回到“我”的视角，在“祝福”的爆竹声中结束。这个“现在—过去—现在”的闭环结构，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隐喻：祥林嫂的故事无论多么悲惨，最终都被吞没在鲁镇“年年如此”的循环中，而“我”的闯入与离去，并未能改变任何东西。这种结构如同一口时间的深井，“我”的回忆将井底的悲剧打捞上来，供读者审视，但最终又任由其沉回冰冷的黑暗。鲁镇的一切，包括人们的同情、麻木与仪式，都构成了这口井坚不可摧的井壁。这种叙事时间的人为处理，与《故事新编》中故意将不同时代并置一样，是一种强烈的干预，旨在打破读者线性的阅读期待，迫使其思考现象背后的循环性与结构性暴力。

其次，在语言层面，“杂语”现象构成深刻的思辨张力。鲁镇是各种话语交杂的空间：四叔“事理通达气力和平”的理学话语，柳妈等人“捐门槛”“阎罗大王”的民间迷信话语，祥林嫂反复讲述“我真傻”的自我创伤性话语，以及“我”所代表的“新党”“出去留学”的现代启蒙话语。这些话语彼此碰撞、交锋，却无一种能真正解决祥林嫂的困境。尤其“我”与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对话，堪称现代知识话语与民间信仰话语的一次短路。此刻，“我”的启蒙知识在生死、灵魂这类终极关怀面前显得苍白而功利，“我”考虑的是“是否增添末路的烦恼”，而非灵魂是否存在本身。这种出于“善意”的敷衍，恰恰暴露了其知识体系在应对个体生命终极焦虑时的结构性缺陷。“我的踌躇与‘说不清’，彰显了启蒙理性在面对深层文化心理与个体生命痛苦时的局限与失语。这种语言交锋，褪去了《故事新编》中夸张的讽刺，转而呈现更为沉痛、内在的思辨，质问着：知识如何才能真正抵达并抚慰人的苦难？”

最后，“看与被看”的模式深化了批判层次。祥林嫂是鲁镇众人“看”的对象，她的悲剧成了人们咀嚼、鉴赏的“故事”；而“我”既是“看”客之一，同时也是“被看”的对象——被祥林嫂追问，也被读者审视。尤为深刻的是，鲁迅细致刻画了“我”在“被看”时的痕迹与自省：当祥林嫂“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地盯着“我”时，那种来自被启蒙者、充满生命渴求的凝视，反而让启蒙者无所遁形，陷入前所未有的道德与智识压力。鲁迅通过“我”这一视角，将读者拉入复杂的意义网络，使我们无法简单置身事外批判“吃人的礼教”，而不得不反思自身：若身处其境，我们会是柳妈、四叔，还是最终选择“逃离”的“我”？这种叙事安排，极大激发了读者的自省意识，是实现思辨性阅读的关键机制。

三、融入教学：高中语文思辨性阅读任务的构建与实施

高中语文将“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列为重要任务

群，其宗旨是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升思维品质”“负责任、有中心、有条理、重证据地表达”。鲁迅小说所蕴含的丰富互文性与深刻思辨性，恰好为这一任务群的教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优质资源，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深度阅读能力。基于互文性理论的思辨性阅读教学，可从以下具体路径系统设计，确保教学目标落到实处。

第一，创设互文情境，提出核心思辨问题。教师不应孤立讲授《祝福》，而应构建“文本群”。例如，将《祝福》与《故事新编》中的《理水》(文化山学者)、《出关》(老子)进行群文阅读，并提出核心思辨问题：“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面临怎样的共同困境？‘我’、文化山学者、老子有何异同？他们‘无力感’的根源何在？”

第二，设计分层任务，引导探究与论证。基础层(文本内)：分析《祝福》中“我”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绘制其情感变化曲线，评价其人物形象。进阶层(跨文本)：分组比较“我”与文化山学者、与老子的形象，填写对比表格，对“对待现实的态度”“知识体系的特点”“行动与结果”等维度进行对比。拓展层(跨时代)：引入当代社会现象(如网络舆论中的“旁观者”现象、知识分子的公共发言等)，讨论“鲁迅在《祝福》中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在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第三，组织多元表达，升华思辨成果。辩论赛：组织辩论“正方：‘我’的逃离是情有可原的自保；反方：‘我’的逃离是不可原谅的背叛”。写作任务：假设“我”在离开鲁镇后，给朋友或《新青年》杂志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对启蒙的再思考，要求引用文本细节进行心理刻画。专题研讨：以“启蒙的负担——从《祝福》中的‘我’说起”为题，撰写一篇小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结合互文文本。

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主动进入一个由多重文本构成的思辨场域，在比较、质疑、论证和创造中，深度理解鲁迅作品的复杂性与现代性，从而真正实现思维品质的提升。

四、结论

鲁迅的小说，以开创性的“跨文本互补”叙事策略，构建起开放、动态、充满对话性的文学世界。从《故事新编》神话传说中的古今狂欢，到《祝福》现实寓言中的沉痛自省，其核心始终贯穿着深刻的思辨精神。这种思辨性，不仅体现在对封建礼教、国民性的批判，更体现在对“批判者自身”——现代知识分子——的无情剖析。通过互文性阅读可见，《祝福》中的“我”与《故事新编》中的空谈家、虚无者、实干家，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群像素描”，揭示了启蒙事业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将这种互文性视角引入高中语文“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教学，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它打破单篇教学的局限，通过文本群构建与核心思辨问题引领，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欲与批判性思维，引导他们从“接受结论”走向“探究过程”，从“理解人物”走向“审视自我”。这不仅为教授鲁迅作品的优选路径，更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使其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终身学习者的关键一环。

(作者单位：西安市西航一中。课题名称：基于项目式学习的高中语文“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教学课例研究。课题号：SGH23Q0124)

滨州市以电商引领农村消费 提振的路径研究

吕厚忠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激发农村消费潜力、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滨州市通过构建完善的电商政策体系、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发展直播电商新业态、推动跨境电商与产业融合以及优化消费环境等多元路径，有效激发了农村消费市场活力。2025年上半年，滨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3%，限上零售额增长12.6%，分别高于全省1.7和5.9个百分点，均列山东省第3位。

一、滨州市农村电商与消费提振的现状

2025年，滨州在全省首批出台提振消费措施22条，推动新纳统商贸企业184家，增长2倍。同时，发布《优化消费环境助力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推出13项重要举措。在农产品上行方面，2025年上半年全市供销社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12亿元，同比增长41%，创历史新高。已建成6个县级集配中心、4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和305个村级综合服务站，为农民提供了日用品配送、农产品上行、快递收发等多元化服务。在消费提振方面，滨州市通过系列促消费活动有效释放了农村消费潜力。2025年，全市计划举办以“迎春、盛夏、金秋、暖冬”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100场，发放消费券3000万元，预计换新商品25万件，拉动消费65亿元以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滨州市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构建农村商品上行、下行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建成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10余个，覆盖150余个行政村，日均处理快递超2000件；配套建设冷链物流中心2处，总库容9660吨，年处理能力2万余吨。

二、滨州市电商引领农村消费提振的多元路径

一是政策激励与消费刺激路径。滨州市通过多层次政策组合拳，构建了电商引领农村消费提振的激励路径。统筹规划全年各类电商促消费活动，形成“一季多主题、全年不停歇”的促销热潮，结合“网上年货节”“618网购节”等关键节点，有效激发农村消费市场活力。创新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活动(进乡村、进社区、进平台、进政企单位、进展会)，打通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截至2025年4月，以旧换新政策已累计拉动消费39亿元，惠及超13万人次享受补贴。

二是直播电商与数字创新路径。滨州市将直播电商作为引领农村消费提振的重要抓手，形成了特色发展路径。2025年，滨州市成立了直播电商行业党委，锚定行业发展关键领域，通过组织“好物好主播”直播活动，动员本地知名主持人、网络主播、驻村第一书记等，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对家乡乡

然”的问题，提升评价的公信力。

除技术创新外，还需配合评价指标体系重构与协同机制搭建。在指标体系上，构建“学生发展、教师教学、院校治理”三维框架，并细化为基础数据、过程表现、成长增值、决策建议四个层级。“学生发展”维度中，基础数据聚焦学籍信息、课程成绩、技能证书等静态内容，确保评价有扎实的数据根基；过程表现层追踪课堂互动频次、实训操作日志、企业实习反馈等动态信息，如记录学生在实训中的操作规范度、团队协作表现；成长增值层通过对比不同阶段的技能水平、分析学生进步幅度，避免“唯结果论”；决策建议层则基于前三层数据，为学生推送个性化学习路径，如针对技能薄弱点推荐补充实训项目。“教师教学”与“院校治理”维度亦遵循此逻辑，前者关注教师企业实践时长、教师参与度及学生学业提升效果，后者侧重产教融合项目进度、毕业生就业质量变化，让评价既覆盖个体成长、也兼顾院校办学质量。在协同机制搭建上，“校-企-政”三方需各司其职，形成闭环。院校作为数据采集主体，负责收集教学过程、学生实训等一手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完整；企业深度参与评价环节，结合岗位实际制定技能标准，如软件技术专业中，企业明确“代码规范性”“项目协作效率”等核心评价要点，并实时反馈实训学生表现；政府则主导数据安全管理与区域质量监测，制定统一的数据库共享规则，避免数据泄露，同时通过对比不同院校的评价结果，掌握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动态。

为确保创新路径落地，还需强化三项保障：一是数据安全保障，通过数据脱敏、分级授权等方式，保护个人与企业隐私，让数据共享更安全；二是差异化适配保障，设计“基础指标+特色指标”模块，基础指标适用于所有院校，特色指标由院校结合办学定位自主选择，满足不同类型职业教育需求；三是政策资源保障，建议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平台建设与人员培训，将智能评价结果纳入院校考核，推动评价改革长效化。

大数据驱动的职业教育评价创新，核心是通过简单实用的技术手段，解决传统评价的痛点问题。这一路径既符合职业教育改革方向，又能切实提升评价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助力职业教育更好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本文为2025年度大连市职业教育研究课题“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制度研究”(序号30)的课题成果)

大数据驱动的职业教育评价创新，核心是通过简单实用的技术手段，解决传统评价的痛点问题。这一路径既符合职业教育改革方向，又能切实提升评价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助力职业教育更好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